改革开放三十年专题

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对外移民

丘立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005)

[关键词] 移民研究；国际移民；移民历史；移民政策；移民峰；移民率；和平崛起

[摘 要] 在中国和世界移民史的框架内，从中国的人口政策、经济发展战略、外资的引进和城市化与就业政策等角度，对中外社会经济性质及移民政策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中国的人口政策和经济发展战略保持了极低的对外移民率。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未来中国国际移民与人口比例将比当时欧洲崛起时低得多、“移民峰”的时段也将比欧洲当年的时段短得多。

[中图分类号] D63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5162 (2008) 02 - 0001 - 09

China's Peaceful Rise and Its Emigration

QIU Li-ben
(Institute of World History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5, China)

Key words: migration studi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migration history; migration policies; Peak of Emigration; migration proportion; peaceful rise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udies China'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the framework of world history of migratio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s adopted with a focus on a number of key issues including China's population policies, strategie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FDI, urbanisation and its links with employment policy. Based upon a comparative study on different social and economic natures embedded in, and different migration policies adopted by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an extreme low proportion of migration generated by China's population policies and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has been maintained in China. The author also predicts that with the peaceful rise of China in the world, the volume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would be much less than that of Europe during the period when Europe rose up as a global power, and the period of "Emigration Peak" would also be shorter than that of Europe.

华侨华人源于中国的对外移民，现代中国移民是世界移民的组成部分。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深入发展，世界移民的规模、流向、结构、模式和影响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世界移民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移民及华侨华人社会发生了哪些深刻变化，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于中国海外移民产生了哪些深远影响，这些问题引起了世人关注。[1] 本文仅就中国的

[收稿日期] 2008-02-18

[作者简介] 丘立本，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和平崛起与中国对外移民问题试做若干分析。

从世界历史角度看中国的崛起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 9 %以上的速度增长。2006 年中国的 GDP 已达 26847. 05 亿美元，为 1978 年的 13. 3 倍，经济总量在世界的排位从 1978 年的第十位上升到第四位；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 17607 亿美元，为 1978 年的 85 倍，从世界第二十七位跃居到第三位；中国外汇储备量突破 1 万亿美元，居世界前列。中国正在迅速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2]

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的历史背景下，在一个拥有五分之一世界人口的国家里进行的，其规模之大，开放度之高，速度之快，影响范围之深远，都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

早在 19 世纪前，中国的农业文明与农业经济就曾达到世界的高峰。美国学者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18 世纪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的 32 %，而当时全欧洲也才占 23 %，足见中国当时的实力。[3]清康熙—乾隆时期（1662 - 1796），世界人口约为 9 亿，中国人口已达 3 亿，中国在自己的土地上养活了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中国的衰落是 19 世纪中叶以后的事情，因此，正如清华大学教授胡安钢所说的，中国今日之崛起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乃是经历了百年衰败之后的“再崛起”。[4]

中国今日的崛起实为“再崛起”，这使我们得以从更长的历史跨度和更宽的空间维度，通过中外对比来考察中国崛起与对外移民的关系。

中外移民历史的回顾与比较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移民大国。自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至明清的两千多年间，中国有过五次大规模的移民潮。这些移民潮，人数都很多，持续时间也很长，为世界历史所罕见。但这些移民潮，均属于封建时期的人口流动，主要从黄河流域向长江和珠江流域移动，大体上都在现今中国领土之内，越出国境向外移民者人数不多，规模不大，主要迁往周边地区。[5]中国人向外移民初具规模是在 12 世纪初南宋以后的事。从那时起，中国海外移民大体上经历了下列五个时期：

（一）从 12 世纪初至 16 世纪中期（1127 - 1567），即从南宋建炎元年，经整个元代至明隆庆元年，前后 400 多年，是中国海外移民初具规模的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人口经过三次大规模南迁之后，其比重已由南轻北重彻底改变为南重北轻，到元朝时，南方人口一度达到全国总人口的 80 %以上。明初，为了恢复北方的经济，虽曾组织数百万移民北迁，但到明朝后期，南方人口仍创新记录，超过了 1 亿。[6]

这一时期，中国北方经济重心已南移，江南各地丝绸、陶瓷等手工业日益兴盛，商品经济获得空前迅速的发展。宋、元两代，造船业和航海技术也有很大提高，指南针的发明和运用，大大促进了海上运输业的发展。北方长年战乱也促使宋、元两代政府致力发展海外贸易，因此，这一时期，随海舶前往与中国有朝贡关系的东南亚各地经商贸易的商人、水手日益增多，一些人因经商或受雇而长期“住蕃”不归，干脆与当地妇女通婚衍生子孙。还有一些因战乱而滞留国外的边民、伤兵和在战争中被掠为奴隶者及在改朝换代时因政治原因而逃到国外的。这一时期的对外移民作为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和政治动乱的产物，累计约在 10 万到 20 万人左右。[7]

（二）从 16 世纪中期至 19 世纪中期（1567 - 1840），即从明隆庆元年全面开放海禁起到清道光 20 年鸦片战争爆发止，为中国海外移民的发展期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明隆庆元年（1567）开放海禁后，中国沿海地区私人海外贸易迅速发展，中国社会在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以中国和印度为两大轴心，以东南亚为媒介而形成的亚洲区域市场此时空前活跃，吸引了大量中印商人前去贸易，构成亚洲区域内的多边贸易网。此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西方殖民者也开始入侵南亚、东南亚及中国的台湾和沿海地区，欧洲和美洲市场开始与亚洲原有的区域市场发生联系。同时，西方殖民者为了在东亚和东南亚建立起各自的贸易据点和基地，竞相招募中国劳动力，因此，这一时期移居海外的中国人，除商人、水手外，还出现了大量的矿工、小手工业者和各种工匠。他们的足迹，东自日本、朝鲜和菲律宾，西到印度东海岸，北起缅甸伊洛瓦底江上流，南至印度尼西亚。一般估计，至鸦片战争前夕，其人数已超过100万，多集中在亚洲商品集散地和西方殖民者新建的城市，如泰国的曼谷、菲律宾的马尼拉、东印度（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和马来亚的新加坡等。可见，这一时期的中国移民已受到欧美资本主义因素的重大影响，西方殖民者一面招徕华商和华工，并将华商逐渐转变为其中介商，另一方面又限制华人经济势力的发展。1603年至1762年期间，菲律宾发生西班牙殖民者五次屠杀华侨事件，1740年印度尼西亚也发生过荷兰殖民者在巴达维亚屠杀华侨的“红溪事件”。[8]

（三）从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40 - 1949）是中国海外移民的高潮时期，也是中国海外移民史上最为重要的时期

目前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绝大多数是在这一时期移居海外的中国移民及其后裔。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将中国迅速卷入世界市场并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随着古老的封建社会的解体，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破产的小手工业者被迫背井离乡，浪迹天涯。从鸦片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00年间，中国海外移民的人数从此前的100多万人增至1000多万人。大多是以契约劳工的身份由广东、福建等中国沿海地区迁移到东南亚各地的，也有一小部分迁至欧洲、美洲、大洋洲和非洲，成为列强开发殖民地和发展国际贸易的劳动大军。从1882年起，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相继实施排华法令，致使那里的中国移民难以立足，人数锐减，这是今天华侨华人绝大多数集中在东南亚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时期的中国海外移民已是世界移民的一部分，中国移民和印度移民共同构成了世界移民大军中的“亚洲军团”，他们在居住国的资源开发、经济发展和当地民族的独立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做出了重大贡献。[9]

（四）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1949 - 1978）是中国海外移民基本停止时期

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东南亚新兴民族国家对移民入境采取严格限制政策，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国际冷战局面的形成也阻碍了国际移民的流动；另一方面，由于新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施行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人口的流动，中国大陆对外移民处于基本停止状态，只有台湾、香港、澳门还有少量的对外移民。[10]

（五）从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到如今，是大陆对外移民逐渐恢复并兴起新移民潮的时期

这一时期的对外移民具有如下特点：1. 从人员结构上看，已由过去的契约劳工或自由劳工转变为家庭团聚、留学、商业与技术移民，知识阶层占有相当比例；2. 从移民迁出地和迁入地看，这一时期的移民迁出地已不限于沿海几省，而是逐渐扩大到沿江、沿边各地和上海、北京等一些大城市；其移入地也因1965年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先后放弃明显的种族歧视政策，实施新移民法而集中到美、加、澳和西欧等发达国家；3. 从民族成份看，这时期的移民已不限于汉族而是扩大至许多少数民族；4. 从移民的动机看，过去的移民主要是为了生存，现在的移民主要是为了发展。[11]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以上是中国对外移民的基本史实。把上述史实置于世界历史中考察，人们不难发现：1. 虽然中国早在17世纪以前已是世界人口大国，但中国的对外移民比起欧洲同时期的海外移民来要少得多。19世纪中叶，中国人口已达到4亿，其海外移民及其后裔只有100多万人，约占中国总人口的0.25%。当时全欧洲人口不到2.5亿，仅在美洲的欧洲移民及其后裔就达1350万人，约占欧洲人口的5.4%，而非洲裔的移民作为欧洲人在美洲的奴隶也已达到650万人。[12] 2. 虽然中国早在汉唐时已是世界大国，到康熙—乾隆时期，农业和工业产值更达到世界的高峰。但是中国在其强盛时并没有出现大量对外移民。中国的大量国际移民是在其衰败的时候出现的。而欧洲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工业化和崛起的100年间，向外移民潮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仅1846 - 1924年间，欧洲向外移民就达4800万，约为欧洲1900年总人口的12%，其中工业化最早的英国，对外移民约为英国1900年人口的41%。而到20世纪60年代，欧洲移民人数累计多达6000万人，大大改变了许多地区的民族构成和世界的面貌。[13]

出现这种强烈反差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和欧洲各国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其社会经济类型和性质以及国家政策也存在根本的差异。19世纪初的中国虽是世界人口最多、GDP仍居世界首位的国家，但中国还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国，处在封建社会的末期，封建统治阶级和中央集权国家的收入还主要来自封建地租和税收，严格的户籍制度把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商品经济虽有所发展但对外贸易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大，资本主义萌芽未能茁壮成长，工商业者的地位很低，因此中国内部仍缺乏对外扩张的重商主义的巨大动力，政府不但不鼓励对外贸易和移民，反而加以种种限制。[14]只有在西方入侵，王朝衰败，中央政府失去控制，被迫与外国签约允许劳工出国后才出现移民大潮。而欧洲的情况则大不相同，欧洲各国此时已由资本原始积累的重商主义阶段先后进入工业革命时期，资本、原料、市场和劳力的争夺十分激烈，殖民地的占有和人口的输出已成为各国的国策，因此欧洲许多国家不但移民数量巨大而且持续时间颇长，呈现出与中国截然不同的景象。[15]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移民与中国移民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20世纪70年代新一轮全球化到来的背景下开展的。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国际移民（在移居国以外出生，滞留12个月以上者）总数已从1985年的8400万人增加到2005年的1.91亿人，约为全球总人口的3%；南北流向与南南流向的移民已各占移民总数的三分之一，国际移民已成为全球现象，许多国家既是移民输出国又是移民输入国或过境国。移民模式也发生重大变化，短期移民、环流式移民正取代永久性移民，国际移民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国际移民的历史正翻开新的一页。[16]

与此同时，随着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中国对外移民的人数也迅速增加。移民的动机、模式、成份和走向等也发生前面提到的重大变化。由于中国至今还没有统一管理对外移民的机构，各有关单位统计移民人数的标准不一，移民人数缺乏权威的统计数字。一般估计，改革开放后大陆出去的新移民大约在200 - 400万之间，加上香港、澳门、台湾的移民，约为400 - 500万人。[17]但目前流行的说法是中国在世界各地有3400万移民，是世界移民第一大国。这种说法把海外华人族群（Chinese ethnicity）和中国移民（Chinese migration）混为一谈，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许多海外华人是在他们的祖辈父辈定居的地方出生的，其中大多数人已加入了当地国籍。[18]把他们当作移民计算也有悖于联合国统计国际移民人数的标准。联合国的统计是以在移居国住满12个月的非移居国出生者为移民的，在移居国出生者的移民后裔为当地人，不在移民之列。所谓世界第一移民大国的3400万中国移民是按血统计的，即不论国籍，也不论出生地，将中国血统的华侨华人统统说成中国移民。如果按血统标准计算的话，欧洲血统人在世界各地者远比中国人多。爱尔兰现有人口357万，侨民300多万，而具有爱尔兰血统的人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多达 5000 万 (其中美国约 4000 万，澳大利亚 540 万，英国 100 万，新西兰 54 万)。[19]意大利现有人口 5719 万，1861 - 1965 年间对外移民达到 2750 万，其移民与后裔约有 5000 万，为意大利国内总人口的 87 %。[20]怎么能说中国是移民第一大国呢。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新移民人数从各方面看还是很少的。即使以 500 万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国内移民累计已达 1.4 亿，大陆出去的新移民只是国内移民的 3.5 %；2005 年国际移民的人数已达 1.91 亿人，大陆新移民也只占全球移民人数的 2.7 %。这个数字对于一个 13 亿人口的国家来说就更小了，还不到中国总人口的 0.4 %。

根据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人口稠密的农业国，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因城市尚无能力吸收大量离开土地的农民，都出现人口大量外流现象。待到工业化进程基本完成，国内就业机会增加，生活条件逐步改善之后，这种现象才逐渐消失，形成了移民潮由低到高再低的过程 (Emigration transition)，也即 Philip Martin 和 Edward Taylor 所谓的“移民峰”(migration hump)。欧洲移民潮由来潮至退潮大约持续了 80 - 90 年，战后的韩国则用了 40 年。[21] Henrik Olesen 认为战后“移民峰”的起点约在人均收入 (PPP) 1500 美元左右，而终点则约为 8000 美元。[22]从微观层面研究移民问题，即从移民个人的动机来看，工资收入的差距也是移民考虑的重要原因之一。Mamadou 的研究认为，如果移民输出国工资收入与输入国工资收入的比例降到了 1∶3，也就是说，如果国外工资降到只有本国工资的 3 倍，那么很少有人愿意冒风险到国外求职，移民就会大量减少或停止。Martin 的比例是 1∶4，而 Faini 的研究结果是 1∶4.5，即国外收入若低于国内的 4 倍或 4.5 倍就很少有人会放弃本国原有的工作，背井离乡出外谋生。[23]社会学家还告诉我们：移民网络是实现移民的重要中介，也是一种社会资本，能大大降低移民的成本和风险。移民网络的存在与否对各国人口国际迁移的状况影响甚大。移民网络一旦形成，便使移民过程获得自行发展的内在机制，可产生“乘法效应”，在一定时期内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24]

从以上由不同学科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世界移民问题所揭示的一些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现象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处在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村富余劳动力近 2 亿，每年净增劳动力近千万，劳动力总供给大大超过总需求。[25]

中国目前人均收入刚刚超过 2000 美元，在世界人均收入排行榜上还排在 100 位以后。正处在 Henrik Olesen 等学者所谓的“移民峰”的“移民段”内。

中国目前工资的收入和移居日、美和欧洲发达国家的中国移民的收入差距很大，例如日本人均收入是中国人均收入的 32 倍，若按实际购买力平价计则为 15 倍。[26]

海外华侨华人 3000 多万，分布在世界 100 多个国家，血缘、地缘、业缘组织随处可见，移民网络布满全球，为对外移民提供了社会资本和便利条件。[27]

笔者曾指出，从这几点来看，在完成工业化、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前，中国出现移民潮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现代化进程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的一种客观趋势，堵是堵不住的。人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加强研究，因势利导，使其既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又能对居住国做出贡献，从而在国际劳动分工中发挥积极作用。[28]

当然，这是就移民趋势而言的，眼下中国海外移民并不多。至于将来中国移民潮的规模究竟有多大，移民将占总人口多少百分比，“移民峰”的起止时段有多长等等，仅从国际经验和一般规律是无法推导出来的，必须进一步研究中国的国情、发展战略和时代特点。事实上，欧洲各国工业化时期虽然普遍出现移民潮，但由于各国国情不同，人口政策不同，进入工业化的时机和战略不同，移民潮的大小和移民峰的长短也就有很大的差别。例如，英国和法国同为殖民大国，英国 1846 - 1924 年移民人数达到该国 1900 年人口的 41 %，而法国却只有其人口的 1 %。又如德国在 19 世纪末加速发展工业后，外出移民显著减少，而工业化进程缓慢的意大利、西班牙、葡萄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牙等南欧国家则直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由移民输出国转为移民净输入国。可见对于具体国家来说，仅仅了解历史的大趋势是不够的，必须进一步研究这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点，尤其必须研究该国与移民问题密切相关的人口政策，分析该国工业化战略及其进程和特点。

从中国的国策和经济发展战略看中国移民的现状

（一）中国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30年少出生4亿人

1949年年底，中国总人口已达5.42亿，由于人口控制未得到足够重视，出现了1949-1958年和1972-1975年的两次生育高峰。自1978年开始，人口问题受到了中国政府的重视和科学家的关注，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大力降低生育率，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并促进了生育观念的转变。中国在社会生产力还不发达的情况下，成功地将生育水平降至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将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分别由1970年的33.43‰和25.83‰下降到2003年的12.41‰和6.01‰。妇女总和生育率仅为1.22，不但大大低于2.1的人口更替水平，也低于日本和韩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经过近30年的努力，中国少出生了4亿人。[29]不仅缓解了人口增长给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带来的各种矛盾，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改善了人民生活，提高了综合国力，同时也大大减轻了人口向外迁移的压力。2007年1月23日，中国又发布《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再次提出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30]

（二）中国以工业（制造业）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吸纳农村亿万劳动力，推动国民经济高速持久发展，减少人口的外流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也对移民趋势产生重大影响。由于中国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工人素质较高而价格低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根据自己的优势和强项，大力发展工业（制造业）。早在2000年，中国第二产业即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就已升至50.2%，大大高于世界平均值（29.8%），也高于韩国（40.9%）、日本（33.3%）和印度（26.9%）。2001年，中国制成品出口已占全部出口的88.6%，高于世界平均水平（78.0%），也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82.0%）。中国已经是制造业生产和出口大国，成为世界市场制造业产品的生产基地和重要供应商。随着工业化的快速进展，中国第三产业比重也将大幅上升。中国这一发展战略和定位，吸纳了从农村流向城镇的亿万劳动力，推动了国民经济高速持久发展，大大减少了人口的外流。[31]

（三）大量吸纳国际资本，使中国劳动力与外资得以在中国土地上结合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另一特点是大力吸纳和利用外资，其数额之大、领域之广是欧洲工业化时期所未见的，也是发展中国家所罕见的。截至2006年9月底，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已超过57万家，累计直接投资超过6650亿美元，来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超过200个，全球500强企业已有480多家来华投资兴业，中国已连续15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位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首位。[32]伦敦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认为，中国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与GDP之比跟英国相同，比美国高3倍，比韩国高4倍，比日本高18倍。[33]外商投资领域主要在制造业，2005年，在外商投资企业中直接就业人员已超过2500万，占中国城镇就业人口总数的11%。也有人认为，仅广东一省，在外企直接间接就业的人员就有1000多万，全国人数应达到4000-5000万人。外资在华开办企业，扩大了劳工求职机会，解决了数千万中国人的就业问题，避免了大量人口的外流。[34]

（四）抓住国际产业转移机遇，积极参与全球分工，在扩大贸易规模的同时解决千万人就业问题

中国2006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7605亿美元，为1978年的85倍。为发展对外贸易，中国建设许多出口创新基地，大力培育自主品牌，提高外贸增长质量。近5年来，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翻了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两番，信息产品出口从 2003 年的 1421 亿美元提高到去年的 3640 亿美元。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不但扩大了贸易规模，还解决了 3000 多万人的就业问题。[35]

（五）开展历史上罕见的城市化实践

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2000 - 2005），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最快的时期。过去四年，城镇化率由 40.5 %上升到 43.9 %，城镇人口新增 7494 万人，年均增加 1874 万人。改革开放以来已有将近 3 亿农村人口迁移进城市；据专家估计，到 2020 年还有 3 亿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届时城镇人口可望超过 8 亿。[36] 城市化的提速，不但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也为解决中国“二元社会”结构打开了通途。同时也大大减少了人口向国外的流动。

（六）劳动就业工程的成就与影响

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国之策”，中国政府向来重视劳动就业问题。到“十五”期末，全国城乡就业人员达到 7.6 亿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2 %以内。五年城镇新增就业 4200 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 1800 万人；五年转移农业劳动力 4000 万人。中国职业培训工作取得较大进展，社会保障事业取得长足发展，劳动关系调整机制初步形成，劳动保障法制建设取得新进展，有力地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大大减少了人口的外流。[37]

应当指出，上述中国这些战略抉择和重大国策，并不是直接针对移民而是针对中国人口众多的特殊国情、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制定的。但恰恰是这些经济战略和基本国策，保证了 13 亿人口大国在经济转型、体制转轨中不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保持了极低的对外移民率。试想，如果没有严格的控制人口生育的有效国策，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之前实现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今天的中国已是 17 亿而不是 13 亿人口的国家了，且不说在如此重大的人口包袱下中国能否取得今天的进步，中国对外移民的压力无疑会比现在大得多。如果中国未能利用大量外资，实现国际资本与中国劳动力在中国土地上的结合，并以空前的速度实现城市化，千方百计地解决就业和再就业问题，使得 7.6 亿的城乡人口获得就业的机会，那么人口外流的压力又该有多大呢？

从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看中国对外移民的趋势

不仅如此，上述中国的人口政策、经济发展战略、外贸出口、城市化与就业政策还清楚表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在不断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实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同时，坚决摈弃世界历史上主要大国通过海外殖民和移民、对外掠夺乃至于发动侵略战争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旧式道路，努力探索和开拓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一条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充分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努力做到中国的发展主要依靠中国自己，中国的困难由中国自己克服，自己消化，不给别人带来麻烦。30 年的实践证明，中国所选择的这条和平崛起的道路是可行的也是成功的。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迄今为止的崛起是通过和平的手段从国际市场获得所需的资金、技术和现代化所必需的资源，是经过自身艰苦努力、通过国内巨大的劳动市场、将亿万劳动力转化为建设国家的巨大驱动力而实现的。人们将看到，沿着这条近代史上后兴大国崛起所从未走过的全新的和平发展道路，未来 30 年，虽然中国人口将增至 15 亿的峰顶，但中国对外移民绝不会像欧洲工业化时期那样以占总人口 12 %的比例涌向世界。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随着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面建成，未来中国的“移民峰”的时段也定会比欧洲当年的时段短得多。Ronald Skeldon 指出，西方某些人士出于“对中国这个人口最多国家未来移民的潜力的恐惧”，担心“中国今后移民的数量会接近一世纪前欧洲向外移民的比例，使世界面目全非”，[38] 这是用西方人的老经验、老眼光看世界，完全不了解全球化历史条件下和平发展的新的可能性和今日中国的实情，如果他们了解上述中国的国策、经济发展战略和各项政策，了解中国开拓的具有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对对外移民的影响，那就用不着如此忧心忡忡了。

[注释]

[1] Jack A. Goldstone, A Tsunami on the Horizon: The Potential for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Paul J. Smith, ed., *Human Smuggling: Chinese Migrant Trafficking and the Challenge to America's Immigration Tradition*, Washington D. C.: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7, pp. 48 - 75; Min Zhou, The Chinese Diaspora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Social Transformations in Chinese Societies 2005*; Ronald Skeldon, *Myths and Realities of Chinese Irregular Migration*, Genev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2000.

[2] 国家统计局:《全年 GDP 初步核算 209407 亿元》,《人民日报》2007 年 1 月 26 日; 刘树成:《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人民日报》2007 年 4 月 11 日; 郑必坚:《思考的历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6 年, 第 249 页。本文付梓前又有新的统计数字进一步说明中国的崛起, 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0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日报》2008 年 2 月 29 日。

[3] 转引自戴逸:《盛世兴衰的启迪 ——著名史学家戴逸答记者问》,《学习时报》第 147 期, 2002 年; 戴逸:《从 2005 年我国 GDP 达 18.2 万亿元说起》, 人民网 2006 年 3 月 21 日。

[4] 胡鞍钢:《中国究竟该如何崛起》,《中国青年报》2006 年 1 月 15 日。

[5] 这五次大规模的移民潮是: 公元 291 年南北朝“八王之乱”引起的“永嘉南迁”; 公元 755 年唐代“安史之乱”后的汉人大规模南迁; 公元 1127 年北宋“靖康之乱”后北人第三次南迁高潮; 公元 1367 年明初汉人的大规模北迁以及 1664 年后清代人口向山地和边陲的大迁移。见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著:《简明中国移民史》,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第 13 - 37 页。

[6] 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著:《简明中国移民史》,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第 501 - 502 页。

[7] 吴凤斌主编:《东南亚华侨通史》,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第 13 - 37 页。

[8] 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 ——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 Carl A. Trocki, Chinese Pioneering in Eighteenth-Century Southeast Asia, in Anthony Reid, ed., *The Last Stand of Asian Autonomies: Responses to Modernity in the Diverse Stat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Korea*, 1750 - 1900,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7, pp. 27 - 84.

[9] Min Zhou, The Chinese Diaspora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Social Transformations in Chinese Societies 2005*; Adam Mckeown, Global Migration, 1846 - 1940,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15, No. 2. 2004.

[10] Ronald Skeldon, Migration from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es*, 1996.

[11] Liu Hong, New Migrants and the Revival of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4 (43): 2005, pp. 291 - 316; 李明欢:《欧洲华侨华人史》,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2 年; 庄国土:《近 30 年来的中国海外移民 ——以福州移民为例》,《世界民族》2006 年第 3 期; 赵红英:《试论中国大陆新移民的特征 ——北美与欧洲的比较》,《八桂侨刊》2001 年第 3 期; 程希:《关于全球化时代留学人员地位和作用的若干思考》,《中国发展》2002 年第 1 期。

[12] P. C. Emmer, European Expansion and Migration: The European Colonial Past and Intercontinental Migration; an Overview in P. C. Emmer and Magnus Morner (Eds), *European Expansion and Migration*, Berg: Oxford, 1992, pp. 1 - 11.

[13] Stephen Castles & Mark J Miller,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Hound mills: the Macmillan Press, 1998; Timothy J. Hatton, and Jeffrey G. Williamson, *The Age of Migration: Causes and Impac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4] 田汝康:《中国帆船贸易和中外关系史论集》,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5] Stephen Castles & Mark J Miller,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Hound mills: the Macmillan Press, 1998.

[16] United Nations, Globalization and Interdependenc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Report of Secretary General,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2006.

[17] Liu Hong, New Migrants and the Revival of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4 (43): 2005, pp. 291 - 316; 张秀明:《国际移民体系中的中国大陆移民 ——也谈新移民问题》,《华侨华人历史研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究》2001 年第 1 期；郭玉聪：《经济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新移民》，《当代亚太》2004 年第 7 期；朱东芹：《中国大陆学者有关新移民的研究》，http：//homewww. osaka-gaidai. ac. jp，2006 年。

[18] Ronald Skeldon，*China*：*From Exceptional Case to Global Participant*，Migration Information Sources，MPI 2004.

[19] Http：// www. Ireland-Information. Com，*Ireland in the World-The Irish Abroad*？2000.

[20] Rudolph J. Vecoli，The Italian Diaspora 1876 - 1976，in Robin Cohen ed.，*The Cambridge*，*Survey of World Migra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 114 - 122；王彦林：《意大利》，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 年，第 35 - 36 页。

[21] Philip L. Martin and Edward J. Taylor，The Anatomy of a Migration Hump，in J. Edward J. Taylor，ed.，*Development Strategy*，*Employment*，*and Migration*：*Insights from Models*. Paris：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1996.

[22] Henrik Olesen，*Migration Return and Development*：*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Expert working paper，Prepared for the Centre for Development Study，Migration-Development Link：Evidence and Policy Option，2002.

[23] Ibid.

[24] Douglas S. Massey，Joaquin Arango，Graeme Hugo，Ali Kouaouci，Adela Pellegrino & J. Edward Taylor，*Worlds in Motion*：*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Castles，& Miller，1993.

[25] 刘树成：《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人民日报》2007 年 4 月 11 日；张维庆：《科学发展观与中国人口》，《求实》2004 第 7 期。

[26]《难以置信的中国与日本的差距》，《环球时报》2005 年 4 月 29 日。

[27] Qiu Liben，The Chinese Networks in Southeast Asia：Past，Present and Future，in Chan Kwok Bun，ed.，*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State*，*Economy and Culture*，Singapore：Prentice Hall，2000，pp. 193 - 206；丘立本：《从世界看华人——华人研究新探》，香港：南岛出版社，2000 年。

[28] 丘立本：《国际人口迁移与华侨华人研究》，载郝时远主编：《海外华人研究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丘立本：《从国际移民角度研究华侨华人问题》，《侨务工作研究》2004 第 3 期；丘立本：《国际移民的历史、现状与我国对策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 年第 1 期。

[29] 张维庆：《科学发展观与中国人口》，《求实》2004 年第 7 期；张维庆：《在中国 13 亿人口日全国电视电话大会上的讲话》2005 年 2 月 6 日。

[30]《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07 年 1 月 23 日。

[31] 李琮主编：《经济全球化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第 291 - 294 页。

[32] 马秀红：《外商对华投资逾 57 万家》，《证券之星》，www. stockstar. com，2006-11-15.

[34] 谢伏瞻：《如何正确认识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人民日报》2007 年 7 月 25 日。

[35] 新华网：《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2007 年 9 月 2 日。

[36] 参见《建设部副部长：2015 年中国城镇人口将突破 8 亿》，中国新闻网，2007 年 8 月 2 日。

[37] 中国国务院：《国务院批转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的通知》，2006 年。

[38] Ronald Skeldon，*Myths and Realities of Chinese Irregular Migration*，Geneva：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2000.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